

中國哲學發微

中國哲學發微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发微

张岱年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11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平装 1—4,720册
精装 1—980册

*

书号: 2088·72 定价: 1.90元

自序

解放以来，我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今选出二十篇，编为一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欣然同意将它付印，这是我十分感谢的。

这是一部论文集，本拟题为《中国哲学史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认为，现在以“论集”、“论丛”命名的书刊已经很多了，为了避免雷同，建议采取拙作《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的“发微”二字。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就总题为《中国哲学发微》。其实是不敢说篇篇都可称为发微的。

这些论文的第一部分，共九篇，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写的。其中《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一篇，一九五七年曾由科学出版社印为单行本。近来许多同志索阅此文，无以应命，故亦编入此集。第二部分，十一篇，是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写的。此外，一九七二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我撰写其中宋明部分的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王守仁、王廷相、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诸章节，一九七八年又补写了汉代的

陆贾、贾谊、扬雄、桓谭以及明清之际的方以智诸章节。这些都一般性的叙述不是论文。这两年又应《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的主编同志之约，撰写了《张载评传》和《扬雄评传》，因篇幅较长，就不收入此集了。

这些论文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前后相隔二十年。基本思想虽属一致，但关于具体问题的见解却有一些变化。例如关于《老子》的“道”，解放前我认为《老子》的“道”指最高原理。五十年代中间，我把《老子》的“道”解释为原始的混然一体。近几年来，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觉得《韩非子·解老篇》以“理”解“道”，还是正确的。“道”仍应是最高原理之义。五十年代旧作中提到《老子》哲学之处，现在就保留原貌不加修改了。

这些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有些是比较复杂的，如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问题，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我所提出的意见不过是初步的管窥之见，远远没有解决问题，今后当再作进一步的探索。其余各篇的意见，亦未必精审。古人说：“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礼记·祭义篇》）我的这些意见，到底有当与否，亦未可知，姑备一解而已。

一九八一年二月六日

张岱年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部分

(一)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	(3)
(二) 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 基本概念 的起源与 演变.....	(11)
(三) 中国古代 哲学的几个 特点.....	(39)
(四)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两个问题.....	(60)
(五)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65)
(六) 关于哲学思想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69)
(七) 张 横渠的 哲学.....	(87)
附一 关于张横渠的唯物论与伦理政治学说.....	(118)
附二 关于张横渠的唯物论思想.....	(127)
(八) 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	(135)
(九)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	(154)

第二部分

(一)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	(199)
(二)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	(215)
(三) 论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	(235)

(四)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	(249)
(五)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联系·····	(275)
(六)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	(307)
(七) 老子哲学辨微·····	(330)
(八) 孔子哲学解析·····	(347)
(九) 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364)
(十) 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	(389)
(十一) 沈善登的哲学思想·····	(407)

第一部分



(一)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

我们要想确定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与对象，必须满足两项基本要求：第一，应该注意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本来固有的条理脉络，也就是发现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来的范围。第二，应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科学的对象与范围。假如这两方面不相应合，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来范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全不相应，那就是证明：中国过去没有哲学，中国传统的学问中没有可以叫作哲学的部门。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考察，这两方面是大致相应的。这就是说：中国本来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也就是包括自然观（宇宙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伦理学说这几个方面。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来范围如何呢？这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

在古代中国，学术的分科不细密。但是否完全混然不分呢？那也不然。在古代中国，学术是有一定程度的分门别类的。古代中国不只有一门学问，而是有几门学问。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了古代的图书，编为七略：一、辑略，二、六艺略，三、诸子略，四、诗赋略，五、兵书略，六、术数略，七、方技略。辑略

是总目录，其余六略就是古代图书的分类。这图书的分类也就反映了古代学术分类的情况。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学术基本上分为六类：一、经学（六艺之学），二、哲学（诸子之学），三、文艺（诗赋），四、军事学（兵法），五、天文算学（术数中最主要的），六、医学（方技中最主要的）。显然，这六门的划分是不严密的。经学是中国历史上一门独特的学问，其中包括历史与哲学思想。在我们的科学分类中没有经学的位置，然而从周末到清代，确然有一门学问叫作经学，这是历史上的事实。经学的内容是与我们所谓哲学有出入之处的。在古代，史学还附属于经学之下。汉代以后，史学逐渐独立起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当然，图书的分类不等于学术的分类，但是其间有一定的联系。假如说，在古代中国，学问只有一种，图书却可以分为几类。那至少也要承认，那一种学问之中包含了不同的部门。只承认一种学问有不同部门，而不承认有不同的学科，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在古代，有专门研究天文的人，如甘德、石申；有专门研究医学的，如医和、扁鹊；有对于文艺有独特贡献的人，如屈原、宋玉。难道我们不应该分别称呼他们为天文学家、医学家、诗人吗？不同的专家，钻研了不同的问题，用心于不同的对象，这不是显然的吗？一个学者可以同时兼治几门学问，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那几门学问不可划分。荀子也作过赋篇，屈原也有哲学观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说在古代诗赋与哲学是混然无分的。在近代以至现代，也有一个学者兼长二三门学科的情况，我们能因此就说在近代以至现代学术还没有分科吗？

所以，应该承认，在古代中国，学术是有一定程度的分科的。而在古代中国的几门学问中，有一门学问类似我们所谓哲

学。

古代中国有“哲人”之称（《史记·孔子世家》），而无“哲学”之名。但是我们可以说，古代所谓“诸子之言”（《汉书·艺文志》）基本上就是哲学（儒家也属于诸子）。《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所谓道术即是哲学的主要内容。所谓诸子之言或者道术之学的范围如何？可以说，它的范围就是天道与人道。《论语》记载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文章、性与天道，就是孔子之学的主要内容。文章即是礼乐，礼乐与性都属于人道。《孟子》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尽心》）。他承认天道是圣人所研求的。《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都说明，古代的哲人，不但要求知人，而且要求知天。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两句正是概括地说明了先秦以来所谓道术之学的主要范围。一直到清代的戴东原，也以“天人之道”为所谓“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明他的哲学著作《原善》的内容道：“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应该承认，“天人之道”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范围。宋代以来有了“义理之学”的名称。义理之学正是与今日所谓哲学意义相同的名称。

就古代的“子”书与后来的“义理之学”的书籍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关于天道的学说包括两方面，一是关于天道的理论，二是关于“闻道之方”的理论，而关于人道的学说又包括三方面，一是关于人伦道德的理论，二是关于“古今之变”的理论，三是关于“治道”或“治国平天下”的理

论。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包括五部分：一、天道观，即自然观；二、方法论，即认识论；三、伦理学，即人生观；四、古今观，即历史观；五、治道观，即政治哲学。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来范围。

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了政治观点，这是与我们今日的科学分类不同的。在先秦时代，天道观，伦理学，与政治学说是夹杂在一起而不可分的。汉代思想家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论六家要指》）。先秦六家的哲学观点与其政治观点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宋代以后的情况逐渐不同了。宋代以后的许多哲学家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不大谈有关政治的问题，而另写专篇讨论政治原理。这就表明，宋代以后，政治学说逐渐独立化了。此外，我们应该把政治观点与政治主张（关于实际政治措施的具体主张）区别开来。政治观点是与哲学见解紧紧相连的；至于政治主张，那就不应作为哲学范围以内的问题来处理了。

我们说，古代所谓诸子之学，宋代以后所谓义理之学，基本上就是哲学。这决不函蕴着，我们研究先秦哲学，只须阅读属于《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书籍就足够了；研究后来的哲学，只须阅读属于后来所谓“子部”的书籍就足够了。决不是如此。显然，在《六艺略》中，在后来所谓“经部”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哲学思想的材料。《艺文志》所谓兵书中也含有辩证法的观点。（后来兵书归子部。）而唐宋以后的“集部”中，更包含大量的关于哲学思想的材料。假如研究唐宋以后的哲学，只看“子部”书不看“集部”书，那就要遗掉很多的重要资料了。此外，我们研究哲学史，应该注意哲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还须注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所以“史部”的书，天算医学的书，

也都是需要探讨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考察多方面的大量材料，这是一定要作到的。

关于哲学史的对象，我仍然主张接受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肯定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国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是科学的，正确的，是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南。这个定义揭示出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哲学史的中心内容，规定了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这个定义固然没有说尽全部情况，但这不足为病，因为定义并不需要面面讲到。何以说它没有说尽全部情况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历史观与伦理学说方面的思想斗争，最主要的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或反动思想的斗争。诚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历史观与伦理学说中也有唯物主义观点或者唯物主义因素。然而，那只是片断的，不成系统的。我们说其中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是一件事；假如说其中主要思想斗争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那又是一件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历史观中或在伦理学说中，所谓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有确定的意义。必须承认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才是唯物主义。假如放宽唯物主义的意义，把历史观与伦理学说一切先进思想都算作唯物主义，那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不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历史观与伦理学说中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峙交争的局面。但是，假如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一直讲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讲历史观与伦理学说的往古来今的全部发展过程，那末，仍然应该说，历史观与伦理学说中的思想斗争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日丹诺夫正是从这个观点来讲的，所以，他的哲学史定义是正确的。

附带谈一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向问题。解放以来，中国哲

学史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确呢？个别同志对此表示了怀疑，主张我们应当改变方向，主张采取一个“新方向”，而这个“新方向”的要点就是着重中西哲学的不同。一种意见认为：“西方哲学着重在传授人们一套求知的方法，一套逻辑上完整的知识系统；中国哲学乃在企图提供一种行动的指南”。在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行动指南，与不合客观实际的谬误的行动指南的斗争。

如果说，应当着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反对硬把西洋哲学的模式套在中国哲学思想上，那是很好的。但是过分夸大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就不正确了。依照上面那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认为，在中国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不是首要问题，而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中也只能有其独特的意义。从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材料来看，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这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承认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虽然中国哲学中所用的名词与西洋的不同。既然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也是首要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历史，而其斗争的领域也是与西洋相类似的。第二，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两点就是解放以来新中国哲学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这两点都是不可动摇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几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绩很少，主要表现了两个缺点。第一，对于具体材料的具体分析不够，没有深入于丰富的材料之中，因而有简单化的弊病，甚至有断章取义，随意引申的弊病，

不能发现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第二，对于过去的哲学遗产往往估计过低，没有深刻领会过去哲学家学说的丰富含义。这两点是互相关联的，都由于刻苦钻研的工夫不够。这两个缺点是必须克服的，现在的问题是纠正偏差，克服缺点，改正错误，而决不是更换基本的方向。

中国古代哲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忽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硬把西方哲学的模式套在中国哲人的头上，是不对的。但是过分夸大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以至抹煞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般性，也是不对的。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这是中西哲学所共同的。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物质在先，唯心主义就是主张思维第一，这也是中西哲学所共同的。理论是如此，实际的材料所呈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中西哲学的不同，决不在于西洋哲学重“求知”，而中国哲学重“行动”。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何尝不重求知？西洋哲学家也追求生活的智慧，着重生活的体验。古代西方的哲学家不待论，近代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与康德，也都特别强调道德实践的意义。所以，不应以重知与重行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然则，中国哲学的特点何在？简单地说，中国哲学在形式方面的特点是采取了论纲式的体裁，在内容方面的特点是肯定了“体用一原”、“天人合一”等基本观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大都是简短的，论纲式的、没有详尽的论证。然而言简意深，其中含有丰富的义蕴。假如认为形式上既然简略，内容也就贫乏，那就是大错了。中国古代哲学在宇宙观方面的基本观点是“体用一原”，即本体与现象的统一。西洋哲学中许多思想家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把本体与现象割裂开来。中国古代哲学家却认为现象亦实，本体亦现。“莫现乎隐，莫显乎

微”。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在人生观方面的基本观点是“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类的统一，肯定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唯心主义者所讲的天人合一与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天人合一意义不同，然而都不将人类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这些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中西哲学在基本观点上虽然有所不同，然而从其研究的范围来看，从其所讨论的根本问题来看，从其思想斗争的基本路线来看，还是大体一致的。

解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向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的基本原则是进行研究的唯一的指南，这个方向是应该坚持的。

（原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1957年

科学出版社出版）